

與他同行——在關係的涉入中撫慰生命的刻痕*

張慈宜、游賀凱**

135-162

2009 年夏天，新竹新埔山上舉行了一個特別的敘說團體。成員年紀從 13 歲到 19 歲不等，出自三個家庭，包括：住在一起，但常不知道彼此狀態的三兄弟；時而吵嘴，但感情親密的一對兄妹，以及外型與內心高度反差，19 歲的團體大姊。成員皆來自於父親或母親被診斷為精神疾患的家庭，此外，沒有太多的共通點。加上，兄弟姊妹參加同一個團體，那些不便讓家人知道的經歷、內心感受遂難以在團體中有出口。以傳統的治療觀點來看，這應該是一個足以引發很多疑慮的團體組成。不過，「我們」本來就不是要「治療」「他們」，他們同意接受願意傾聽、理解他們的人陪伴、協助，但不需要被治療。「撫慰」或「抒解」或許更接近我們這兩位青少年教育工作者一路走來信仰，並且堅持在做的事。對許多我們所認識的處於台灣底邊社會，或被判定缺陷家庭中的孩子來說，我們相信那些因階級、經濟結構、道德偏見的磨難而在生命中所留下深淺不一的刻痕，唯有對於孩子的真正信任與關愛可以抒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撫慰」。信任他們的對抗，他們的反叛，或甚至出走，都是奮力在被圍困的生命中突破往前的步伐。兩位作者藉由重新書寫 2009 年夏天的這個團體，反映回觀我們的青少年教育工作，並對我們未來的工作路線提出進一步的思辨。

關鍵詞：助人工作、青少年、敘說團體、精神障礙者子女

* 對於匿名審查者的懇切意見，謹致謝忱。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佛光大學生命學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二屆主體性敘說與生命療癒研討會」(2010/07/14)。原論文題目為「從都市到山間——在敘說的汗水中療癒偏見的刻痕」。

** 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023966@mail.fju.edu.tw

游賀凱：慈濟大學諮商中心附設資源教室輔導員

Walk with Him/Her: Alleviate the Scars Through Involvement Relationship

Tsz-Yi Chang & Ho-Kai Yu*

In the summer of 2009, we shared a marvelous journey in a narrative group in Hsinchu mountain with young friends whose parents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mental illness.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group was unusual. Members' age ranged from 13 to 19 years old, and they were from three different families: three brothers who lived together but were rarely aware of each other; a cynical adolescent and his younger sister with whom he fought a lot, but were close as well; a manly yet delicate and considerate 19-year-old young girl who was always the big sister in the group. Except for the parent's mental condition, there was little similarity within the groups. In addition, with siblings in the group, various unspoken feelings were even harder to be shared. From a traditional treatment point of view,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group was controversial and doubtful. However, "we" never meant to "cure" "them". They agreed to accept help and companionship from those who listened to them with sincerity and empathy, but not treatment. Instead of "treatment" or "therapy," providing "relief" is more like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in our educational practices for young people. For these youngsters who are living in 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bottom of society, who come from what are so-called "defective" families, tribulations due to clas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moral prejudice may somewhat scar them in the course of life, but we truly believe these scars can be relieved by trust and love.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relief." Through re-writing the stories of the group in the summer 2009, the authors reflect and invite readers to new prospects for adolescent educational practices.

Keywords: *adolescent, child of depressive patient, helping behavior, narrative group*

* Tsz-Yi Chang: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o-Kai Yu: Counselor, Resource room, Tzu Chi University

與他同行—在關係的涉入中撫慰生命的刻痕

張慈宜、游賀凱

「我要把事情做得更好。可是，我做不到。」

.....

「你不必把事情做得正確。和我在一起就行了。」

(橋口亮輔，2009，《幸福的彼端》(*All around us*))

壹、緣起

- 2010/6/25 上午 09:02:15 阿歡，你最近好嗎？
- 2010/6/25 上午 09:02:32 看你的暱稱好像不太對，有事的話，可以聊聊。
- 2010/6/26 下午 09:27:06 慈宜老師：我過的還可以，您過的如何呢？
- 2010/6/26 下午 09:28:10 那個狀態只是一時無法接受朋友對待自己的態度，竟是那麼的不如我的預期...
- 2010/6/26 下午 09:29:40 我沒事的...謝謝您即時的關心！讓我心冷的時候感到一股暖流！謝謝！
- 2010/7/4 上午 01:30:52 真抱歉還要您抽空看我的留言！
- 2010/7/4 上午 01:31:34 只是有件事從小學就一直在困擾著我...¹

阿歡是我們去年應風信子協會邀請去帶領的一個少年／女團體中的一員，上一次聯絡已經是半年前的事了。她平常忙於工作，很少上 MSN，結果兩則因為 MSN 苦澀暱稱而起的離線訊息，換來數日後，阿歡將一個糾纏她已久的痛苦秘密，在她生命中像黑洞一樣的東西，鼓起勇氣傾瀉而出，尋求協助。

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是一群懷抱夢想的人，為精神障礙者努力實踐出

¹ 這些文字皆引自阿歡和第一位作者的 MSN 對話。

來的一個「桃源二村」²。初期爲了找到一塊適合有機耕種的土地，南北辛苦奔波達三年之久，在 2004 年獲得了天主教華光智能發展中心的慷慨相助：提供新竹新埔山上的土地給風信子使用，夢想的種子終於落地開始生根茁壯。

風信子協會成立的宗旨³，是想爲精神障礙者創造出新的可能，藉由讓精神障礙者從事有機耕作，來重新思索土地和人被對待的方式。精神障礙者並非只能成爲被醫院豢養的人，也不是沒有能力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風信子認爲只要被賦予適當的空間，精神障礙者絕對有條件能夠擺脫「社會資源的消耗者」⁴這樣一種歧視性的標籤。藉由蔬果的耕作，一方面讓精神障礙者在接觸土地，親手培育植物成長的過程中，重新體會自己的生命，並且通過勞動與收成來肯定自己的能力與尊嚴。另一方面則是藉由「有機」這種善待土地的耕作方式，來實踐一種不管是對於「人」，或者是對於「土地」，都該秉持的一種非剝削性，非用「生產力」／「產量」來綁架所有價值，而是互利合作式的，友愛共榮的基本態度。

2009 暑假在新埔山上的這個團體，是風信子協會在針對精神障礙者進行家訪的過程中，看到幾個家庭的孩子可能需要協助所提出來的一個方案。由於組成團體的三個家庭中，有兩個家庭都是經濟上比較困難的家庭，因此風信子以提供少年／女在桃源二村一週一日的農場工讀機會，結合敘說團體的進行，順利邀得 6 位團體成員。基本上孩子們早上在農場伙伴（成年精神障礙者）的指導、協助下從事農作，中午享用過伙伴所準備的大鍋飯菜之後，下午一點到三點的時間即爲敘說團體進行的時間。團體結束後，孩子們即與兩位團體帶領者（即本文作者）一起乘坐風信子協會所提供的箱型車下山。

² 行為學派心理學大師 Skinner (1948/1992) 相信如果社會按照行為學派的心理學理論來加以規劃安排，將爲人們帶來更為美好的生活。他將這些理念寫成小說 *Walden Two*，挪用了梭羅的文學名著 *Walden* 之名來隱喻理想生活。Skinner 的這本小說在台灣出版時，其中文譯名慧黠地以國人所熟知的陶淵明的「桃源」來替代梭羅的 *Walden*，而絲毫不損其寓意。風信子在新埔山上開拓的有機農場使用「桃源二村」此一名稱，其中寓意不言自明。

³ 詳細的說明，請見風信子協會的網頁（風信子協會的宗旨，無日期）：
http://www.cuckoo-land.org/modules/xoopsfaq/index.php?cat_id=1

⁴ 同 3。

貳、團體的成員

接下來，很快地介紹一下這個團體的成員⁵。

所有的成員都有一位憂鬱症的家長。但除了年紀最大（19 歲）的阿歡對母親的憂鬱症確實下過一番功夫研究，並有相當程度的理解之外，其餘五位年紀介於 13 歲到 17 歲之間的成員們，對於父親的憂鬱症則缺乏較為周全的認識。

舉例來說，雖然明確地知道父親的疾病診斷為憂鬱症，幾個少年仍然有時候會脫口而出稱父親罹患了躁鬱症。由他們的發言脈絡判斷：主要原因大抵乃是因為父親的脾氣暴躁，動輒發怒，並時而遷怒於孩子，所招致的一種顧名思義式的聯結。

團體中的三兄弟分別為：暑假後就要升上國一的小乖、國二的小豬，以及即將進入一所私立高工就讀的瘦皮猴。據他們表示父親經常「抓狂」，「沒有來由地」辱罵、毆打他們，印尼籍的母親不堪忍受父親的暴力行為而出走。而在孩子們日漸高壯，且政府大力推廣 113 婦幼保護專線之後，身體暴力的情況已獲得改善。母親離家之後，努力工作賺錢，建立了新的親密關係，但幾乎每個週末都會找時間回來探望三兄弟⁶，塞點零用錢給他們，有時候也會帶他們出門遊玩。三兄弟對於母親仍有很深的眷戀，他們可以忍受有時候跟著母親一起來的「叔叔」，認為離開父親對母親來說是個比較好的抉擇，但非常抗拒父親有「第二春」的可能性，瘦皮猴忿忿地說：「娶一個打一個」⁷，兩個弟弟也立刻附和。經過團體中的澄清，主要的癥結在於他們在心中為母親保留了一個寶貴的位置，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取代。

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小乖精巧伶俐。他稱自己像個「堰塞湖」一樣，因為「每次被人家說：這小孩真可憐～以及被同學排斥恥笑，我就會像存錢一樣的在『存眼淚』」⁸。雖說如此，小乖在班上還是有蠻不錯的人緣，與班上女同學的相處尤佳。小乖同時也是母親最為疼愛的孩子，他的零用錢比兩個哥哥都要來得多，而且如果母親對孩子們有什麼特別的安排的話，小乖也是那個被託付的對象。

⁵ 為了保障團體成員的隱私，所有成員名稱都採用化名處理。

⁶ 母親回家探訪之前都會先打電話，通過事先約定的暗號來分辨父親是否在家。如果父親在家的話，三兄弟就會藉口跑到外面慣例約定的地點與母親見面。

⁷ 這段談話摘自第二次團體記錄。

⁸ 這是一次團體家庭作業（「自我的描繪」）中，小乖描繪自己的文字。

小豬和瘦皮猴的衣服經常有些污漬，也不曉得是他們自己洗衣服沒洗乾淨，還是不介意把衣服弄髒所致，無論如何他們身上並無異味傳出。兩人的學業成績在班上都是倒數的。小豬說自己從小學開始就沒有寫作業了，現在上課都沒在聽，經常看著窗外發呆。繳交「自我的描繪」作業的那次團體，小豬的紙頁上一片空白。然而，一向空手上山的他卻在當日慎重其事地帶來了一個 A4 的活頁資料夾，裡面夾著兩頁雪白如新的活頁紙。於是我們明白我們不該用「不想寫作業」這樣的簡單詮釋來看待這回「空白」的意義⁹。

面對一個問題的詢問，或者是一個敘說的邀請，小豬一般而言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反應，反應也通常比較簡短¹⁰，在團體後期，成員們已經熟稔了之後，成員們經常搶著幫小豬把話完成。有平時的良好互動作為基礎，小豬對於成員們的「好事之舉」並不以為意。其實，小豬也有反應非常迅捷的時刻。有一次針對瘦皮猴說他之所以「自殘」是因為「那時候剛好有刀子，我就割下去」¹¹。小豬這時候突然從桌上的筆筒裡面抽出一支美工刀，說：「那現在也有刀子阿，你要不要割？要不要割？」¹²在這個行動的精準性中，自有其對哥哥個性及狀態的清楚拿捏。

除了拒絕團體成員們對於自殘所賦予的種種解釋，瘦皮猴也對自己的生活保持相當程度的神秘。舉例來說，他自陳認識一個大他十幾歲的乾哥，會在他遇到麻煩時（如：有人想要修理他時）出面解救。但當進一步被問到如何跟這位乾哥聯絡時，瘦皮猴則表示都是剛好遇到。其他成員虧說：就是有那麼剛好！這種時候，瘦皮猴會聳聳肩，一邊露出一貫的微笑，裡頭有掩不住的得意與神秘，一邊用微笑的眼睛巡弋在場的觀眾，注意觀眾們的反應。瘦皮猴是這樣描述他自己的：「我這個人就是比較好說話做事豪爽，可是我看到同學或朋友被打被噏我都是第一個跳出來幫忙除

⁹ 在最後一次團體結束後，團體成員們聯合送給我們的卡片中，小豬則不再以「空白」的方式出現，他寫道：「十次一來過的好快，好想就做 20 次喔……時間好快喔 `^´ 上課慢長時間好慢，暑假過的好快。謝謝慈宜老師、賀凱老師。」

¹⁰ 在這裡我們非常謹慎地不使用「反應遲緩」，或者「反應較慢」這類的字眼，因為這類的說法都容易立即引來「對號入座」式的一連串「想當然爾的」「診斷」，然後這些「診斷」就成了比「活生生的」當事人還要「具體」的「事實」。對當事人而言非常不公允。正如法農的沈痛呼籲：黑人渴求作為普同性的「人」而不可得，人們眼中始終見到的是「黑人」及「黑人的行為」（Fanon, 1971/2005）。

¹¹ 摘自第二次團體記錄。

¹² 同 11。

裡事情¹³」。

接下來要介紹的則是小武和婷婷，不斷鬥嘴，甚至吵架，卻感情親密，就是這對兄妹的寫照。爸爸未發病前，爸媽攜手在菜市場經營滷味攤，當時家裡也還沒有被親戚倒債¹⁴，全家常常一起出去玩，全省各大旅遊景點都有他們的蹤跡。「苦日子就要來了」¹⁵，這是父親出院前夕，在大夥下山途中，婷婷突然冒出來的一句話，事實上也具體描繪了家境陡然下墜，緊接著父親發病，家裡所面臨的處境。

2009 年的夏天，經常往返於住院與出院的父親，脾氣已經被繁重的債務與疾病折磨得更加暴躁，不堪忍受任何「噪音」，壓抑、苦悶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家。母親每天睡四個小時，像顆陀螺般運轉，撐起家庭經濟及家人的照顧重擔。哥哥口中「嬌慣」、「白目」的國二生婷婷，也許是利用在家中被保護的位置，企圖盡可能維持自己原先生活的軌道來對抗家中的鉅變。而 17 歲的小武，由於經濟問題，高中只讀了一個學期就中輟了¹⁶，家裡的沈滯氛圍讓他窒息，小武另尋跳舞、音樂、結交朋友、飆車作為出口，聽他說他的朋友多是孤兒院的少年……

最後要介紹的這一位成員阿歡，她在團體裡的角色，像是其他成員的大姊姊。舉例來說，在團體裡討論到憂鬱症時，她會發言補充說明憂鬱症的種種症狀，以及分享生活中該如何照顧或應對憂鬱症家人的方式。

阿歡不太說她與母親在家裡的故事。我們感覺她並非刻意隱瞞，她曾經對我們說過團體時間有限，而且這個團體的形成難得，她想把時間留給年輕成員們，讓他們多說話，有需要時她再分享就好。於是，我們知道她並不是對這個團體感到不安，或是對於罹患精神疾患的家人有難言之隱，而是對長久陪伴母親（母親在阿歡國小的時候即曾發病）的她來說，或許某些忿忿不平或是委屈的感受仍然在她生命裡發生，而她卻和年輕成員發展出不同的看待方式。在陪伴母親的漫長生命經驗中，她叛逆過，然而，母親的憂鬱症及複雜的家庭糾葛，導致父母已於母親患病後離婚，最終她主動積極地扮演起母親之最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當一般同年紀的少女還在享受著被呵護照顧

¹³ 摘自一次團體家庭作業——「自我的描繪」，並且原樣保留少年的錯別字，如：「除裡事情」。

¹⁴ 在小武的理解裡，被倒債而把房子賣掉是促使父親罹患憂鬱症的主要因素。

¹⁵ 摘自第七次團體記錄。

¹⁶ 由於雙親都揹著債務，因而喪失辦理助學貸款的資格，無法考上公立高中的小武，沒有能力負擔私立高中職的昂貴學費。

的角色時，善良體貼的阿歡已經在生命的磨練下學會如何關照別人的需求，然後把自己的需求退位到後面。

支撐阿歡能夠堅強地擔綱起照顧母親責任的力量，除了有姊姊相互支持一起分擔責任，家中經濟狀況尚稱安定，毋須疲於奔命等有力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阿歡一直將母親對她的愛銘記在心。爲了阿歡的學業著想，當年母親精挑細選地選擇了一所離家非常遙遠的學校，然後不辭辛苦地每天花上超過兩個小時的時間接送，颳風下雨從不間斷。這些點點滴滴的愛匯聚到阿歡的心中成爲能量，讓阿歡在度過國中的叛逆時期之後，暗自告訴自己：母親曾經爲她犧牲這麼多，今後換她來照顧母親了。

曾經，我們也思考過 19 歲的阿歡，要去承擔照顧母親的責任，是不是太過沉重？但很快地，我們認識到我們使用了一種不知變通的「年齡」框架來看待阿歡，其實那是阿歡一路走來足夠厚實的生命經驗所轉化而來的選擇。看清楚這一點，我們也就學會尊重阿歡選擇面對我們以及團體的姿態。與此同時，我們也讓她知道除了團體裡的時間，她可以在任何時候選擇用她熟悉的方式與我們聯繫、討論她正在思考的議題，本文首頁所描述的對話即是在這種脈絡之下出現的。

在團體成員介紹這一節的最後，必須向讀者們說明的是，兩個具體因素的存在，導致接下來對於我們團體工作及相關背景的說明，聚光燈將會集中到其他的成員身上，而很少帶到阿歡的身影。一方面是由於如前所述，阿歡在團體中大多以照顧者的姿態出現，很少提及個人的困難。另一方面則是慮及阿歡在團體結束後才向我們揭露、尋求協助的數個議題，皆涉及高度的個人及家族隱私，因此即便後來我們協助她發展出對其家族歷史及個人困難處境的重要理解，亦不便在此透露此一方面的工作細節。無論如何，透過其他成員的故事，讀者仍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團體工作的面貌及精髓。

參、身爲精神障礙者的子女可能面對的處境

團體進行的時候，小武與婷婷的父親住進醫院的精神科病房。醫院離他們家是幾個鄉鎮的距離，如果要從家裡到醫院探視父親，他們得搭三十分鐘的客運到火車站，再從火車站搭乘十餘分鐘的電聯車到醫院所在的鄉鎮火車站，接著步行約十分鐘才到達醫院。一趟路程下來，都是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而小武經常得往返醫院與家裡，爲了帶他父親到醫院樓下抽菸，只爲了那不到一小時的抽菸時間，小武自己要花上近三

個小時的時間往返。有時候會聽到小武說自己不一定有空能去，可是如果母親正在準備滷味生意而抽不開身時，他總也抗拒不了母親說：「這樣你爸爸一整天都沒有人帶他出來」，於是他推辭的是自己與朋友的相約，然後出現在醫院樓下，陪著父親抽菸，是一對父子的身影。

小武在一次我們團體裡看過介紹憂鬱症影片後的討論裡，提到自己與心情不佳時父親的相處。在沒有繼續升學的生活裡，小武和許多這個年紀的青少年同樣熟悉網咖和網路遊戲的世界，這些青少年次文化的場域提供了他生活裡的某些樂趣。在父親心情不佳的時候，小武也曾經試著要帶父親去網咖上網，想讓父親了解年輕人的世界，也想幫忙父親抒解心情，結果因父親沒有興趣而作罷。小武試圖用自己生活中習慣的方式來協助父親，卻無法連接上父親那時身處的憂鬱氛圍，讓小武直接遭遇到個人對待之間的無力。

小武告訴我們他沒有參加國中畢業旅行，不願意花三千多元去那種套裝行程，因為在父親未發病之前，父親是開著車子帶著全家人到台灣各地旅遊的。小武在說這件事情時是輕鬆的，也沒有顯露出委屈，可是我們仍然想過小武或許是因為家中經濟狀況的困難，而選擇不參加畢業旅行。身為家中的一員，小武同時在面對的是家庭身處於社會弱勢位置的壓迫，未滿十八歲的年紀，身處僻遠荒涼的山間村落，加上連代步的機車都沒有，面對家中的經濟困境，小武在找尋打工的機會上遭遇很多困難，退而求其次的是選擇減少某些他認為「不划算的」花費。相較於其他同年齡的少年，小武確實表現出一種「急於長大」的世故，可以嫺熟地對於眾多世情加以稱斤論兩。

小武是這群孩子裡年紀最大的男生，雖然他常常侃侃而談，口才便給，也願意向團體揭露他的家庭生活及他的內心世界，可是這並不代表他能夠輕易的與人談及身為一位精神障礙者家屬的身分。小武曾和朋友提過父親的事情，卻被朋友拿來開玩笑，從此之後他就不說了，把自己的精神障礙者家屬身分給隱身起來，而許多心情也隨著為了避免被他人的眼光或言語傷害而隱身壓抑著，或者透過其他方式來宣告自我認同。像是小武身上的品牌服飾與金屬飾品，或與朋友到市區逛街、泡網咖，以家裡此時的經濟狀況而言，這些消費必然是相當程度的經濟負擔，卻是小武不願折衷的選擇。

身為一位精神障礙者的孩子，有許多委屈必然承受，社會對精神障礙者既有的誤解與偏見，不僅發生在精神障礙者身上，同時也間接的迫使精神障礙者家屬一起承受。Larson 和 Corrigan (2008) 歸納出精神障礙者家人經常遭受到的污名 (stigma) 對待主要為：責難、恥辱，和受到污染。社會大眾往往責怪精神障礙者的家人應該為

其罹病負責，於是家屬們因為這種責難的眼光而倍感恥辱。而「污染」的概念則是社會上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子女會被父母的精神疾病所感染。就華人特有的文化脈絡來看，污名化的情況有可能更加嚴重。傳統的道德觀傾向於將家裡有人罹患精神疾病與先人或者家族的失德、品行不端連結在一起，在現代都會地區這樣的觀念可能已經日益淡薄，但仍有將精神障礙者的家庭病態化的傾向（Phillips, Pearson, Li, Xu, & Yang, 2002）。

Larson 和 Corrigan（2008）回顧過去的相關文獻，指出社會的污名化眼光經常導致精神障礙者的家屬採取下列的因應措施，或者是招致以下的後果：如隱藏家裡有人罹患精神疾病；迴避社交，人際關係變得比較疏遠；自尊（self-esteem）較低等。

小武和其他幾位團體成員，一方面必須面對伴隨家長罹患精神障礙而來的家庭經濟困境，以及情緒張力、家人之間矛盾的擴大，另一方面卻由於前述的社會偏見無法將這些辛苦向外訴說，得到同理與支持。而當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回應這個世界所給予的嚴苛挑戰時，在世俗的眼光，或者說在主導價值的眼光看來，卻容易被歸類為問題學生、非行少年。這種歸類本身拒絕對於生命的厚度進行一種歷史性和脈絡性的理解，而熱衷於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將所有對社會秩序可能造成騷動的個體都標定為「偏差」¹⁷，而無視既定的社會關係與秩序遠遠不是對每個人都同樣平等公義。

以小武為例，國中讀放牛班，高中學業中輟，經常與朋友在外遊蕩，流連在網咖、街舞活動中，偶爾跟著朋友去飆車。而且，他講起話來這樣世故而譏諷。所有這些外顯的「指標」及行為，都讓「問題」或者「偏差」的標籤可以很容易地貼到他身上。

社會對於遊蕩在外的青少年充滿了道德恐慌的焦慮，脫離「家庭」和「學校」監督的青少年不是容易被傷害¹⁸，就是容易對他人構成危險，總之與危險脫離不了關係

¹⁷ 根據標籤理論的奠基者 Becker（1963）的說法，偏差就是規則的違反，因此「偏差」是「由社會所創造的」（p. 8），「藉由制訂那些一旦違反即構成偏差的規則，社會團體創造了偏差」（p. 9）。根據這樣的定義，Becker 進一步引伸說「偏差者是那些成功被貼上標籤的人」（p. 9），然而，Becker 同時也注意到，不僅貼標籤的程序是選擇性的，有些人還未違反規則就被貼上標籤，另外一些人則即使打破規則也不會被懷疑，因而不會被劃入偏差者的陣營；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社會團體都有均等的權力來決定「社會規則」。

¹⁸ 這種流行的觀點其實是建立在這樣的一種意識型態之上：即青少年（adolescence）被視為是一段衝動、不成熟，並且學習和道德發展可以發生的時期。但學習和發展要能夠發生，必須在適當的督導和教導之下（Loader, 1996）。已經有非常多的文獻

(Matthews, Limb, & Taylor, 2005; Walkerdine, 2005)。危險的想像進一步合法化了家庭和學校對於青少年的控制，然而 Corrigan (1979) 田野調查中一位少年的指控直指核心：「你可以用大理石來建造它，但它還是一座血淋淋的學校」¹⁹ (p. 11)。

此外，Corrigan (1979)、Loader (1996) 及 Matthews 等人 (2005) 的青少年田野研究皆顯示聚集在街角聊天或閒蕩的青少年，最主要的原因乃是除此之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Loader 對此有一段發人深省的闡述：「對於公共空間的一般使用並不總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選擇。毋寧更是一個因為年齡所造成的排除效果，同時被自主私人空間及各種文化資源所排除在外」(p. 50)。像小武這樣的孩子，如果家境不豐或甚至困窘，因尚未具備經濟上獨立的能力，網咖或者街頭、公園、購物中心等公共空間可說是最經濟實惠的社交、休閒娛樂場所，其他的休閒項目都要昂貴的多。另一方面，就如同 Loader (1996)、Muncie (2004)、Matthews 等人 (2005) 所注意到的，公共空間是青少年相對可以較少受到成人監督的地方，在現今的社會安排中，青少年在「家」中並不具有足夠的自主性和隱私性。對家中有精神障礙者家長的青少年來說，此一情形可能更加嚴峻得多。

對小武兄妹來說，由於父親罹病後特別怕吵，他們在家中必須承受較其他青少年更多的壓抑，不能發出太大聲響，不可以太晚打電腦或看電視。而看到父親的憂鬱苦悶及家中徘徊不去的低氣壓，則讓他們心情晦澀沈重。至於三兄弟，則要承受情緒不穩定，可能找他們出氣的父親，因此他們或在家中各自尋找一個可以明哲保身的位置²⁰，或者尋找外面的活動空間以為抒解、休閒，或避免淪為出氣對象的空間。

那麼，是否一如主流的意見所斷定的：他們正使自己陷入了一種高度的危險與麻

(如：Aries, 1962; Cunningham, 1992; Hendrick, 2001 等) 都以詳盡的歷史研究的方式，向我們揭櫫現今「童年」(指未成年人) 的概念是經過長久演變而來，並非「天生本質」如此。然而在發展心理學取得了它對於未成年人的知識權威地位之後，前述的關於青少年的意識型態已經屹立不搖，絲毫不受到質疑。如欲進一步討論發展心理學與當代針對未成年人所實施的各種實踐之間的關係及影響，則已超出本論文的範疇，但可以提醒讀者注意的是：發展心理學之所以崛起，並取得它今日的地位，其實亦受到其背後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變遷歷史所影響。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Urwin (1986) 及 Hendrick (2001) 的著作。

¹⁹ 對於那些在學業成績戰場上落敗的孩子來說，他們所收到的歧視性、貶抑性眼光及對待，說是血淋淋似乎並不為過。

²⁰ 此項因素部分解釋了為何三兄弟彼此之間呈現一種顯得有距離的互動關係。

煩當中，又或者他們正在製造可怕的社會問題及威脅呢？Corrigan（1979）、Loader（1996）及 Matthews 等人（2005）等人的研究都不支持這類普遍的看法。在 Corrigan 田野研究中遊蕩在街頭的青少年，大部分的時間，根據 Corrigan 的說法是「什麼也不作」（doing nothing），他們只是站在那兒聊天、開玩笑，搞些惡作劇，以殺時間。Loader 的研究則發現青少年所可能惹上的麻煩，經常與警察有關，這是因為警察被賦予的任務和意識型態，使得他們經常與成群使用公共空間的青少年相對立所致。Loader 回顧相關文獻，指出青少年所惹的麻煩，大部分都是瑣碎、短暫的，是長大之後就會拋諸腦後的東西。至於，Matthews 等人的田野研究則進一步做出與刻板印象相反的結論：鄰里公共空間提供了青少年安全、自由，及社交的機會。「街頭」構成了（半）自主的空間，或者是青少年可以施展自己社交生活的「舞台」（stage）。

因此，對我們來說，我們並不把團體成員們在外遊蕩、上網咖的行為視為一種危險或者麻煩的徵兆，更別說是貼上「問題」或「非行」的標籤。從整體學校、家庭生活的具體脈絡理解中，我們理解並且尊重他們如何為自己的生活空間進行選擇²¹及安排。而且，非常重要，我們注意到，他們從未真正「出走」，他們總是「回家」。從諸如我們稍早前所述及的小武長途跋涉去醫院陪父親抽煙的舉動中，我們確實看見他們對於生病的父親／母親的惦記與溫柔。不管是以哪種形式來因應他們的存在處境：倔強叛逆、機伶靈巧，或者溫順求全，都是他們各自為自己聳立著諸多難處的生命所展開的奮鬥，我們對此深感疼惜。

因為疼惜，我們自許成為年輕生命的同行者，我們想要撫慰由於各種體制的擠壓、由於各種意識型態及道德偏見、由於人在體制和結構的壓迫下或者不堪傾倒、或者不得不相互傾軋所帶來傷害，在年輕生命中所留下來的一道道深淺不一的刻痕。

以本小節的主角小武為例，一般人（甚至包括小武的父母）沒有條件去批判性反思自己身上不知不覺中所繼承的主流社會價值，因而也沒有意願去理解小武的生命脈絡（遑論給予同理），反而動輒根據各種意識型態和刻板印象而對之加以批判、歧視。而這些不友善的標籤及歧視性眼光及對待方式，都可能會在小武的心中刻下傷痕。這些具有傷害性的標籤及歧視包括：懶惰、愛玩，愚笨等（因學業成績不佳）；品行不端、行為偏差的壞孩子、社會麻煩的製造者等（因學業中輟及在外遊蕩等）；瘋子的兒子、病態家庭、精神病的高危險群等（因父親的憂鬱症）；好吃懶做、不懂得體恤

²¹ 這選擇當然是在環境的各種限制之下，折衝出來的選擇。

家裡困境的自私鬼（因中輟後未能即時找到工作）等等²²。

然而，用心看完我們在這一節中對小武所做的描述及相關文獻闡釋的讀者們，相信應會對小武產生不一樣的理理解。

肆、用什麼來撫慰抒解？

這些孩子不是會主動走入諮商室的一群人。雖然他們的世界裡聳立著不少困難，但他們一直以來以各自的方式在努力著，他們沒有向「治療」乞求什麼。那麼我們走向他們，到底想要幹嘛呢？

最初始的時候，坦白說，我們還真是不知道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只是想試著去理解這群孩子，試著去尋找看看我們能夠跟他們一起發生些「什麼」，而這個我們當時還不知道的「什麼」對他們而言是有意義的。我們既不是輕忽我們的任務，也不是傲慢到自以為可以隨機應變，無所不能。而是我們過去的訓練和經驗告訴我們，當我們越能夠放下一些框架和設定時，其實越可能有機會聽到、看到更多東西²³。而我們

²² 我們對於這些刻痕的辨識，部分來自於團體成員的陳述與對話，部分來自於兩位作者過去陪伴少年的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實踐知識。前者的部分茲以兩例說明之。小武在團體中敘說他曾將父親患精神疾病一事告訴朋友，卻換來朋友們關於「瘋子」的一些玩笑（對小武的影響請見正文另一處（頁143）對此事件的描述），而另一位成員亦有類似的經驗：小豬的父親被老師要求到校溝通事情時，因其比較激動的言語及動作表達，讓小豬被同學投以異樣的眼光，此後小豬想盡辦法阻絕任何父親可能到校的機會。此外，小武的中輟無業在其家道傾頹的惡劣狀況映照下，格外顯得觸目，在團體中曾遭遇多位成員質疑他怎麼不去工作，能言善道的小武幾乎難以抵擋，逼得妹妹婷婷出面解救，說明小武實在不是不願去工作，而是難以找到工作。由此可以想見，小武在團體外亦必須面對這類批評他沒有為家庭負起責任的責難。

²³ 師從夏林清老師，從非結構性的團體中去學習團體動力，是我們團體工作的重要基礎。同時亦與余德慧老師所倡導的「非目的性」理念，有某種程度的共鳴。余德慧引用布希亞（Baudrillard）在《物體系》中的說法來闡釋他的觀點：「一個物的 function 其實往往就會遮蔽了這個東西；一旦我們忘記了它的 function，我們才會開始以不一樣的方式來珍愛那個東西，才會去撫摸它的材質等，也才會使物品能真正的顯現，而不是永遠只認識到物件的功能性層面，僅此而已」（余德慧，2010，在「人文臨床與療癒課程構想圓桌論壇」之發言，慈濟大學人文臨床與療癒計畫電子報，8，22）。

兩人過去各自的青少年教育工作經驗中，讓我們對一些基本元素抱持信心：信任、關係的涉入，行動力。只要我們堅持這些，孩子們會帶著我們前進。稍後我們會讓讀者明白，上述看似口號般的簡單方案，其實是我們各自花費了很大的力氣，歷經了困難與失敗，而體悟到的實踐知識。

接下來，我們將不仔細介紹我們在團體室中所進行的團體工作，反而欲以一兩件我們在團體室外所做過的事，以及曾經做過的思考來突顯我們的青少年教育工作路線。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寫作策略，有兩個重要的原因。首先，就我們的方法而言，關係的涉入是一切助人或教育工作的核心，關係也存在於不同的生活場域之中，因此我們打從團體一建立開始，就同時進行著各種團體室中及團體室外的的工作。其次，既然相較於其他的團體治療或小團體助人工作模式，在諮商室／團體室之外所進行的工作最能夠顯現我們的方法特色，那麼要讓讀者們了解我們的方法，便應該主要從此差異處著手。

在此之前，先以幾幅快照來讓讀者們對我們在團體室中的工作（即下文的「不及格的父親」小節）有個基本認識，毋寧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不及格的父親

在我們一方面同理成員們因為父親或母親的精神疾病所遭受的苦難，一方面也試著想讓他們理解父／母親現今的狀態，除了生物性的因素之外，很大一部份其實與社會體制的傾斜壓迫，無法予人善待有密切的關聯時，孩子們並不是每個人都買單。小武同意生活在社會中有許多不能為個人所控制的環境條件與社會力量，但從頭到尾他始終堅持將父親定調為一個「不及格」的父親。

針對這一點我們嘗試過一些方法，試圖協助小武理解一位父親的勝不勝任，其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不全然是個體可以完全掌控的。舉例來說，我們想協助小武分辨「沒有能力」與「沒有意願」之間的差別，邀請小武思索是否有可能父親其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不是不願善盡照顧孩子之責。小武則強調如果一個人夠努力，他就可以做得到。他以自己為例，說他之所以學業成績不好，是因為學校老師都很爛，那些功課他沒有興趣，如果他有意願讀的話，一定可以讀得好，沒有問題。

再舉我們的另外一次嘗試為例，我們從疾病的比喻著手，想要凸顯生病這件事並非當事人可以掌控，然而生病卻會對當事人的各方面皆造成影響。我們在團體中提出：「曾經有人說過『憂鬱症可以說是一種心靈的感冒』」，邀請小武想一想感冒是否

是一個人可以完全控制的？小武立即回應感冒吃了藥就會好，怪罪父親不僅不好好吃藥，而且對於家人試圖幫助父親提振心情的建議也都不願採納。此外，他堅持宣稱要不要成爲一個父親至少是一個人所能夠決定的，如果不能善盡照顧孩子的責任（用心關懷），就不應該把孩子生下來。

表面上看起來，團體中所有的努力似乎都不成功，每項嘗試都被伶牙俐嘴的小武打了回票。但我們絲毫不因此而喪氣，或對小武感到失望。我們進一步探究爲什麼小武需要這麼堅持？作爲團體的帶領者的我們，經常花時間檢討反映團體中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意義，從中釐清我們下一步可能可以做些什麼。是在如此這般的反覆參看中，我們「看見」小武在團體中花了很多的時間來說明自己與父親是「不同的」。因此，我們似乎比較明瞭小武強硬的拒絕姿態的深層涵義了。小武需要相信個人的奮鬥是可以改變命運的，只要他夠努力他就可以活出跟「無用的」父親不一樣的人生。小武的憤怒或許正是支撐他不向命運投降的重要力量。

然而，孩子們確實有能力理解我們將鉅觀的社會力量拉進來闡釋人的存在狀態的一貫立場。我們在團體中介紹了《泰利的街角》²⁴這本書中的故事，說明爲何有不少貧窮的男人會「拋家棄子」，因爲主流社會衡量人的尺度一再地將他們判定爲失敗者、好吃懶做的人（而刻意遮蔽其實是因爲結構和體制的偏斜，使得「一個願意工作，而且有能力工作的男人卻無法賺到足夠的錢，來養活自己、妻子與一個或更多孩子」（Liebow, 1967/2009, p. 63），在家中面對妻兒時，也就是在面對自己沒有承擔起「及格的」丈夫和父親所應盡的責任，也就是時刻在面對著自己的無能與失敗。在我們講著這本書的父子／女故事和作者所提出的扼要分析的當下，成員們都很聚精會神的聽著，不像有些時候的團體，他們會彼此吐嘈或開玩笑。該次的團體結束後，與其他成員一樣，對於「類學校活動」²⁵充滿抗拒的婷婷主動將書借了回去，後來歸還時，婷

²⁴ 《泰利的街角》是人類學家 Elliot Liebow 改寫其博士論文而出版的一本書，根據的是 Liebow 從 1962 年 1 月開始針對美國華盛頓地區的貧窮黑人男性所進行的為期一年半的參與式田野觀察所得。作者在這本書中除了講述了精彩動人的故事之外，也針對他所觀察到的重要現象做了理論分析。

²⁵ 在團體初期，成員們只是看到團體帶領者的面前攤著一疊白紙，帶領者的一句話尚未講完：「大家還記得我們上週放的電影……」「要寫心得報告噢？」「不要，好無聊喔。」「學校都有在寫，無聊死了。」「真的很無聊。」（摘自第二次團體記錄）這樣的反應，就排山倒海而來。

婷告訴我們這是一本不錯看的書。孩子們不僅能懂，而且不管他們口裡面再怎麼抱怨，他們其實對於精神障礙的家長都有一股亟欲瞭解的動能²⁶。

二、最後一天

我們團體的最後一天是在 KTV 度過的。團體進行途中，成員們就屢次表示很想出去玩，於是我們決定滿足大家的心願。憑著自己老派的想像，我們本來是謀劃借用風信子協會的箱型車載大夥一起去徜徉於好山好水之間，但徵求成員們意見時，KTV 選項在酷熱的夏天中擊敗其他選項而出線。

大家在 KTV 中唱得十分盡興²⁷。結束後，阿歡有事必須離開，小武和婷婷也必須回家幫母親的忙，於是就由我們兩人帶三兄弟去吃飯。

問三兄弟想吃什麼？剛開始時，他們怕我們花錢，推辭說隨便吃吃就好。因為三兄弟經常以泡麵果腹，我們有心讓他們大快朵頤一番，一再保證錢不是一個問題。小乖的眼睛一亮，於是你知道他確實是有想去的地方，再鼓勵一次，小乖就給出了一個火烤兩吃吃到飽餐廳的名字，原來這是一家母親帶他們去過的餐廳。我們兩人都不是新竹在地人，對於這家餐廳一無所知，三兄弟熱心地提供各種線索。我們開著箱型車在城市裡轉過來繞過去，一無所獲，三兄弟卻捨不得放棄。

當我們在城市的巷弄內穿梭尋覓時，三兄弟顯得興致高昂，話說個不停。「就跟上次一樣，前面坐著叔叔與媽媽，我們坐在後面。」在叨叨絮語中，突然傳來這麼一句話，讓我們心頭一震。當我們最後終於找到了餐廳，一向比較穩重的小乖，明明腳踩著涼鞋卻像個滑冰選手般輕盈地在寬敞的餐廳走道裡溜滑起來時，你知道他內心裡確實是滿滿的喜悅。

在食量最大的小豬也舉手投降了之後，我們原本計畫要帶三兄弟到附近的頂好超市去買足幾天份額的生鮮食物，讓他們回家可以自行烹煮。然三兄弟害怕爸爸責罵他們拿人家的東西而躊躇著。繼續聊天的過程中，問起小乖為何常常眯著眼睛看東西，小乖說因為度數不夠。瘦皮猴則緊接著說起他的眼鏡在好幾個月前打籃球時，被弄破了。然後，一個驚人的秘密也跟著現身：小豬根本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不知道這樣

²⁶ 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例子是：阿歡在我們放映介紹憂鬱症的影片之後，也將影片借回家。

²⁷ 桃源二村農場亦有兩位伙伴與我們一起同樂，雖然成員們一週只上山一次，但經過一個暑假的相處，成員們與經常指導、照顧他們的幾位伙伴已經建立了良好的交誼。

的事情已經存在多久了？於是，我們當下改變了我們的計畫，決定帶三兄弟去配眼鏡。

到了眼鏡行，驗了光，讓他們挑了各自喜歡的鏡框。瘦皮猴說他想配隱形眼鏡，瘦皮猴瘦骨嶙峋，雙頰也因為瘦而有點凹陷，但他確實有對漂亮的眼睛。告訴他還是先配眼鏡吧，等到他日後開始賺錢的時候，可以存錢配隱形眼鏡。

我們走出眼鏡店的時候，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分了。孩子們回家還得轉上兩班火車及一班蜿蜒繞行鄉間的公車，是該要告別的時候了。這最後一天，我們似乎需要一點儀式來分離，在新竹火車站前，我們請路人幫我們拍了幾張合照，以傍晚時分極美的靛藍色天空為背景。囑咐孩子們好好照顧自己，然後我們各自踏上歸途。

三、必須離開父親的孩子

在團體快要結束前，我們從三兄弟及風信子協會那兒分別得知消息：三兄弟的父親即將住院接受治療。我們在團體的時段內和團體外，都花了時間瞭解三兄弟自己的意向與打算。

三兄弟最渴望的是母親能夠回來照顧他們。他們曾探詢著向母親問道：「爸爸去住院之後，我們該怎麼辦？」據稱母親回以爺爺會回來照顧他們。瘦皮猴夾帶著怒氣說道：「都一直推給爺爺，也不想爺爺年紀多大了，還要洗腎！」²⁸另外兩個兄弟也立刻附和大哥的說法，一向體諒母親的三兄弟，難得異口同聲地表達了他們的不滿與委屈。團體中的大姊小歡以自家的經驗同理母親的為難，召喚出小乖愛的記憶：媽媽曾經說如果不是三個小孩太多，她就會把他們全帶走。三個小孩她都很愛。

三兄弟過去曾經有過被安置的經驗，除了瘦皮猴表現出一種「豁達的」態度，表示接不接受安置他都無所謂，兩個小的都堅決表示拒絕接受安置，寧可自己照顧自己。也許是有過不愉快的安置經驗？也許也並不是安置的機構沒有善待他們，而是某種宛若「被家人遺棄」的感受如鯁在喉？

在團體結束後，隨著父親住院的日子越來越近，風信子協會的工作人員也開始聯絡母親、尋找適當的安置處所。我們和風信子討論可行的安排，除了將三兄弟的意向和態度傳達給風信子之外，也試著拋出這樣一個議題：三兄弟平時雖然與父親住在一

²⁸ 這裡的談話都引自第七次團體記錄。爺爺平日住在台北，並且需要到醫院洗腎，週末時才會回到新竹。爺爺並不與父親住在一起，週末時，三兄弟會去爺爺家吃飯、打電腦、睡覺。

起，但其實他們已經各自發展出照顧自己的能力，父親住院期間，是否可能讓他們留在自家，再看相關的成人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支援？風信子認真地評估了這個方案的可能性，並且開始著手洽詢可能的人手，試圖組織一支可以輪班對三兄弟提供關照的義工隊伍。

事件的最後發展是：爺爺擔下了父親住院期間照顧三兄弟的重任。但無論如何，這個事件「要求」(demand) 我們以嚴肅的態度思考：什麼樣的安排才是對三兄弟來說比較好的安排？才比較符合當事人的利益？

我們無意宣稱我們找到了一個關於安置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這絕非事實。我們試圖想要表明的正是：世界上並不存在一種「一體適用」的「完美」方案。每個個案家庭的各種特殊狀況皆需列入考量，而未成年當事人本身的意願也應得到重視。而不是自動假設接受善意的安置單位的安置就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誠如 Woodhead (2001) 所指出的，判斷什麼是未成年人所想要的，值得擁有的，又該如何達到，一向都是由家長、老師、政策制訂者、社會所決定，而不是由青少年自己決定。這其實都與我們先前²⁹所提到的對於青少年的某種固著的意識型態脫離不了關係。

在這一小節的最後，我們要說明的是：現在讀者們所看到的我們的團體工作樣貌，其實是兩位團體帶領者誠懇而努力地走過一段不算短的行程之後，所暫時抵達的一個中途站³⁰。接下來，為讀者簡介兩位作者如何走到今天這個位置，或許對其他的助人工作者可以起到某種程度的參照作用。

四、敘說，對生命的涵養與願意涉入—游賀凱

團體成員們認識我，可能是從生命裡擁有相近的經驗開始，我告訴他們，我和他們一樣家裡有精神障礙者的家屬，而且是在生命裡很早的時刻，我帶著這個認識生活著，認識著自己的父親身為一位憂鬱症患者，並且選擇以自殺離世。

父親的精神疾病與自殺離世，差異於主流社會中所建構的父親圖像，造成這生命經驗無以透過學校的正規教育而形成理解途徑，只有沉默與藏身以對，作為抵擋任何可能遭致的誤解或污名眼光的策略。然而，在成長中騷動不安的自我認同，無法在靜默的放置裡被肯認；成年之際，對自身與父親的連結召喚了直視生命的行動，而選擇

²⁹ 註腳 18。

³⁰ 我們會繼續向前走，而且相信自己能夠走得更遠。

自機械工程學系轉讀心理學研究所，親近輔大能夠敘說的土壤，並在這土壤中用四年完成一個自我敘說研究的文本³¹，同時也承載了一個自殺者遺族的家族生命故事。

因著這個自我敘說研究的過程與完成，始以關建出一個理解自我複雜生命經驗的取徑，取徑於敘說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與實踐，是回到人與人的關係中，在照見彼此生命的時刻，有一份尊重與伴隨的相挺，才因緣俱足的在深化的探索過程中對自己的生命有所感受，而感動。

我帶著經驗過敘說的自己，到了花蓮服役，尋找不願到學校上課的國中小學生，邀請他們回到學校，或者，邀請他們不用在身著制服的我面前奔跑，我並不願強制他們回到學校，我希望可以聽他們說說自己的故事，可以是在網咖裡、寺廟中、道路邊、速食店舔著霜淇淋、便利商店吃著早餐、網路上的即時通訊，或者看守所裡的小廣場。

面對著這些看似放蕩不羈的年輕生命，可以有很多選擇，選擇作一個分內的角色，在說起已經飢餓幾天的孩子面前，表示會請老師幫忙；或者，帶著這個孩子到賣場裡為他買上幾天份的食物，然後聽他隔天來對自己說他已經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因為他真的太餓。在找尋不到逃家數日的少女時，表示僅能等待警察的消息；或者，夜裡去找這位少女在路邊練跳將的朋友，聽朋友說起少女的逃家是為了逃離會傷害她的繼父，比不知內情的警察先一步找到少女，讓少女接受社工的保護安置。

我相信這些年少生命，不如標籤代表的僅僅是中輟生、非行少年、少年虞犯、單親家庭小孩、隔代教養小孩、原住民家庭小孩，這些極度化約性的標記，從來不會讓生命變得更容易對待，更容易的只是在主流系統裡的分流，而分流的終點是邊緣化的極點。

假使在這些標籤化與系統分流過程中沒有人願意涉入他們的生命，沒有人願意被他們的生命涉入，在他們的成長歲月裡都會記得這些不被在乎的感受，從少年帶著這些感受而青年、成年，進而為人父、為人母。

我在花蓮服役結束後，研究所博士班的吳台齡學長找到新竹一起做自殺防治的工作，對自殺企圖者做個案管理，對自殺者遺族做追蹤關懷。因而，我其中一位的工作對象是一個月自殺數次的個案，是讓醫療系統也無力應對的境況，精神科醫師除了定期開藥之外只能等待這位個案因再度發生自殺行為被送到急診時會診；臨床心理師

³¹ 游賀凱（2006）。孤獨行者朝向麥田捕手：自殺者遺族的敘說與實踐。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無從介入，個案曾經在心理治療過程中受過傷害，不願接受任何諮商或心理治療；公部門社工判定個案家庭收支不符補助標準，無法提供經濟協助。這位個案，在既有的系統中幾乎孤立無援。

身為個案管理員，我並不會開藥、我也沒有臨床或諮商心理師證照、我沒修過社工師考試所需學分，我只有寫過自我敘說，但我知道這個生命需要不被放棄，個案的家人也需要知道他們一家人不是真的孤立無援。個案的孩子有兒福單位的社工定期訪視，個案的伴侶受我之邀進入自殺者遺族敘說團體，敘說親人自殺離世的生命經驗，個案在我家訪時可以對我擺臉色不和我說話，或者對我抱怨有多不值得繼續活下去，而我說出我父親與家人的故事，也說著：「讓我們再試試看，讓你自己和自己約定看看」。

離開這個工作後的一個月後，我依然和他們家人保持聯絡，得知有些事情已然不同，個案告訴我，儘管不時仍會想要自殺，但在行動之前想到家人、醫師、我會因此而難過，而大幅減少了自殺的舉動。個案後來和我分享，在這麼多公部門的人員介入過程中，只有我最不怕死，被罵了、被拒絕了、被冷淡以對了，還是願意繼續去接近他們，那才使他們相信，這是真的在乎，不是工作職責而已。

這些敘說的經驗裡，我相信某些生命的轉化不在於助人的程序或系統的結構是否合模，卻關乎有沒有願意拿真實樣貌作陪的相互涉入，這種涉入不著言語，端看心意。

在這個精神障礙者家屬團體結束的幾個月後，我和小武不經意的通上電話，他在電話裡告訴我他父親因病過世，我和他確認了喪禮的時間和地點，告訴小武那一天我會到。

那一天，我和慈宜都到了喪禮的會場，喪禮上主要是小武父親的親人，喪禮辦得簡單而莊嚴，幾乎沒有親人以外的人出席。我們從喪禮開始等到小武和家人送父親火化後，走上前和小武、婷婷說話，他們得趕往下一個地點，我們沒有機會多說什麼，遞給他們一些錢，希望他們兩個先把自己照顧好，有需要幫忙再連絡我們，那幾十秒鐘裡，就看著他們眼淚要溢了出來。

允諾要到喪禮，顧慮的很少，惦記的很多，自己經驗過幾場親人離世的喪禮，那孤寂會在儀式裡突如其來，那時，如果有為了自己而默默出現的朋友，就是超越言語的陪伴，而此刻的陪伴，就是一輩子的記得。記得有人對自己的在乎，勝過距離與時間的為難，也像是在說：「原來自己值得被這般善待」，而轉化也從這裡開始，這感動是新的生命經驗，會連結到個人的生命脈絡裡，新生樣貌。

在對話的開展中新生撫慰

對我而言，撫慰可以發生，我相信那是因為曾經被撫慰過。

自己在不同場域的助人工作中，遇見了很多，也邂逅了許多生命的樣貌，太多無法用言語以蔽之，很多時候只能懷想，什麼也不能說，因為面對這些生命，那尊嚴與厚度，豈容他人言語。

何況，年輕無知如己，怎麼去說那中年、那老年、那母子、那父女，更多是那變動不羈的當下，不知道如何以爲。如果有一點點對人的感覺，都要歸於一段一段願意彼此相見的緣分。

研究所裡的那段時光，在文字裡回溯家族裡對一位喪父男孩的善待，相信人心溫暖充沛，即使家人不擅言詞，仍有心意傳遞，被疼惜，也不被忽視。那一切的開始，是我被撫慰的開始，聽見眾多的爲難裡，對年輕生命的優先看顧，有時，甚至不惜代價。我思忖，那只是因為我們是彼此的家人。

在花蓮服役的那段時光，面對多位年輕奔放孩子時的姿態，我從來不敢說是自己在書本知識裡的浸淫所獲，卻是想起自己的青少年，知道每一個孩子都有孤獨，知道每一個家庭都有難處，知道每一個父母都有痛苦，橫亙在孩子與這世界之間的不是他們的桀驁不馴，是他們的孤獨不被理解。從這裡開始，面對孩子才有可能多給他們一點空間，讓所謂的邊緣青少年，對似乎格格不入的世界可以有一個緩衝，甚或連結，而那是從尊重他們的孤獨與辨識他們的樣貌開始。

「他們是『問題少年』，還是『少年』？」

這提問是確立我和他們關係的一步，也是確立我和他們如何彼此相待的一步，如果他們是問題，那麼處理問題的方案是把他們帶回學校；如果他們是少年，對待少年的方式可以是理解他們的處境，也讓他們理解我的行動是爲了產生對話及討論選擇的空間。於是，除了自安置機構逃離的少年，我不曾強硬的帶過任何一位少年回到學校，即便，在與少年們對談的隔日，他們仍未出現在學校，但我至少知道少年們過得如何。因此，邀請少年的對話的出現，無關回校與否。

曾經，有位長得比我還高的少年，我們有時在校外遇見會聊上幾句，但他那陣子幾乎不到學校，他似乎在顧著生病的母親，而他生病的母親其實有其他親人在照顧著，有時，我到了他家，他就在家裡睡覺，不想到學校上他不想聽又或者聽不懂的課。他母親過世後的那一陣子，我對他有些擔心，他繼續在家裡睡覺，我無從得知他的狀

態。到了我退伍要離開學校的那天，他出現了，給我一個擁抱，我們沒多說什麼，我想，也許他記得我們曾經在上課時間裡到麥當勞吃霜淇淋，也許他記得我告訴他我在乎的是他能不能到學校來和我說上幾句話，而不是他願不願意少一點曠課時數，我記得，他不那麼在乎那一紙畢業證書。

介入他們的生命，不必然承載改變，卻在對話的過程中，在既有的孤獨外，與可能已然斷裂的主流教育系統，與少年們發展出不具審判性的連結，這連結是對話的意義所在。

只是也有可能，主流教育系統已不再吸引少年，包括家庭系統。我找尋過一位少女，習於深夜返家，也習於不在學校出現，直到司法系統的力量強制介入，在少年虞犯的角色下，她被強制收容於少年看守所中。那是我最感無力的時刻，少女的不上學，有可能是對於主流教育與家人關係間的不滿而反動，但在少女未發展出對目前生活的新的理解之前，司法系統的強力進入，壓制她的反動，使用權力將少女收容，是複製了少女在學校中、家庭中被權力壓迫的處境，也是強化規訓的再現。

後來，持續邀請少女對話，轉化形式在看守所裡通信，因至看守所探望會壓縮家人與少女的交談時間，多是請少女家人幫忙帶信或是寄信至少女舍房。在信裡得知，少女在與校園、家庭、街頭生活差異極大的看守所裡，感受到選擇的取捨與每日探視的家人，我們之間的對話往少女的個人處境開展，少女對自己的生活因差異化的活動場域而有了覺察。

少年與少女，後來並沒有變成每日準時上學的學生，不過我與他們相處的過程，卻讓校園裡的老師與我，都對他們多了很多感覺，覺得他們有情，覺得他們與這世界不再那麼斷裂而忿忿不平，覺得對年輕生命的工作，不顯於一時，也覺得，如果堅持對話的開展，我們都會看見他們不同時刻的真實樣貌，從來，那就不會只是「問題少年」而已。

我於是相信，邀請旨在創造對話發生的條件，而對話的意涵在於我之於他們不使用階級與權力的不平等，甚至意識到可能的不平等，並試圖減少權力的傾斜，或者將權力使用於他者以創造我與年輕生命對話的時空，都是值得在他們身上發生的事情。

五、信任及涉入的勇氣，始於「看見」並且轉換自己的視框——張慈宜

與賀凱不一樣，在我有意識的選擇一條比較邊緣的路線之前，很僥倖地我的生命沒有被邊緣化，或被排擠出去的經歷。對我來說，要真的靠近這些社會位置與我非常

不一樣的孩子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2002 年冬天，我接受我的博士班同學吳台齡的邀請到一所少年矯正中學³²帶團體。這是我接觸所謂的非行少年或問題少年的開始。一直以爲自己只會讀書，缺乏直面人生挑戰／困境的智慧與勇氣，所以在發展與「邊緣少年」³³的進一步接觸的時候，經常飽受驚嚇。由於篇幅有限的關係，茲舉一例說明之。

阿建是我在矯正學校帶領團體時認識的少年。在團體結束後，我們倆維持了大約兩年的通信，一日他來信告知他已經離開矯正學校，正住在某個中途之家³⁴。我去中途之家看了阿建兩次，第三次欲再前往探訪時，聯絡過程中，中途之家的工作人員告訴我阿建已經逃跑。

這個逃跑事件迅速引發了我的震驚與擔憂，擔心少年這下沒書可以讀了怎麼辦？前途是否更加艱辛？一個 16 歲的少年獨自在外生活得自己養活自己能否過得好？會不會爲生活重新逼上犯罪之路？我的擔憂簡直沒完沒了。幾日後，當我與我的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不定期督導夏林清老師談起阿建的逃跑事件時，夏老師的一句話有如當頭棒喝，夏問我：「你以爲如果能順利地從一個爛高中畢業的話又怎樣？」

我這才看到自己身上的矛盾：原來自己一邊批判體制的不公不義，對弱勢階級的壓迫的同時，一邊又對於體制外的選擇充滿了不信任！這簡直就是徹底的精神分裂！

批判教育學傳統，花了很多的力氣揭發「教育機會均等」根本是一個謊言，卻合法化了主導階級對於其特權經濟、文化地位的壟斷。提醒我們注意，在一個由各種團體組成的社會中，到底是誰的知識、誰的價值、誰的世界觀得以在學校中被傳遞？誰的願景得以在學校中被勾勒？而「差異」又如何被嘲笑、被貶抑爲「不正常」（如：Bowles & Gintis, 1977；Apple, 2004；Apple & Buras, 2006；McLaren, 1998/2003）？

批判教育學所強調的這些東西，在我尚未有系統地涉獵這些文獻之前，其實已經隱約地知道學校體制以及其所支撐的資本主義遊戲規則—功績主義（meritocracy）意

³² 矯正學校所收容的少年是受到感化教育處分的少年。

³³ 這個廣爲流傳的字眼其實很不精確。誠如蔡明亮在接受訪問時所說的：「你看我的行爲，好像我在反好萊塢，但其實是好萊塢在反我，在反創作。因為我們不能邊緣它，它能邊緣我。」（張士達，2010 年 6 月 20 日。中國時報，C3 版）我們認為更能夠精準地描述這些少年所處的社會位置的字眼其實應該是「被邊緣化的少年」。

³⁴ 少年的父母離婚多年，父親以打零工爲生，由於官方認定其家庭功能不足以撐持少年，遂將少年安排於中途之家收容之。

識型態（當然，當時我還不知道這類的專有名詞），都有某種程度的虛妄性，因為學校從未像它所被期待的：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個人。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呢？

問題出在對於學校之外的空間，主流軌道之外的生命可以怎樣開展，我缺乏想像的能力，因而不覺中被無所不在的主流媒體對「他者」的描繪方式所感染，他者都是低賤的，危險的，命運起伏跌宕、凶險四伏的。我不接受低賤的說法，但凶險脆弱的想像確實佔領我的腦袋。學校或者主流軌道之外的世界充斥著毒蛇猛獸，我十分擔憂阿建是否有能力可以應付得了（實則是不信任他有應付的能力），我害怕他被生吞活剝！

與夏老師的簡短對話，讓我看我自己的視框（看事情的框架），原來我把主流體制外的選擇看成盡是悲慘與危險，原來我除了不信任自己面對人生困境的能力之外，也對少年應付生命挑戰的能力充滿了不信任。也就是說：我把少年們想像成脆弱、需要保護與指引的³⁵。

看到了自己的視框，看到了自己的矛盾，問題還是沒有獲得解決，直到我做了陣頭的田野研究。是我的陣頭朋友們讓我瞭解到主流軌道之外的世界仍然很開闊。是陣頭田野的經歷，是陣頭朋友們的生龍活虎，讓我看到不在主流晉升階梯³⁶上行走的人，沒有好的學歷，好的社會位置的人，一樣可以活得很好。甚至，對我而言，他們比那些汲汲營營在階梯上拼命想要往上爬的人還要活得更好³⁷。是這個重大的領悟讓我得以轉移對「邊緣」少年們的視框，不再把他們看成易受摧折的充滿苦難的靈魂。於是，我開始比較懂得欣賞他們身上的力量，開始能夠信任少年對自己未來所做的不同於主導價值的選擇。這麼一來，我肩頭的擔子輕了（青少年們不是我一沒有善加保護就跌個粉身碎骨的脆弱物種），膽子也就變大了，我也就更能夠信任當下與青少年們互動

³⁵ 讀者讀到這裡，當已十分明瞭：將青少年視為衝動、脆弱、不成熟、必須受到保護和指引的意識型態是如何強韌地入侵我們的腦袋，影響我們的思考、情感，和作為。

³⁶ Williams（1983）認為階梯（ladder）這個比喻是布爾喬亞階級之社會概念的一個完美象徵。

³⁷ 當然這裡所謂的「活得更好」，是已經擺脫了主流社會用來衡量人的尺度，不是以主流價值觀所定義的「成功」或「成就」來對人加以評判。對於這一部份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張慈宜（2010）。邊界上的演出者：在「文明」社會中撐出抵抗與創造的空間。應用心理研究，45，149-171。

共構出來的某種行動意向，並努力將此行動意向實踐出來。

重要視框的轉變，像是點燃了一支火把，照亮了我先前在忐忑不安中摸索著前進的雜沓足跡，讓我得以暫時指認可能可以前行的方向。然而火把的火光可以照亮一段旅程，卻不可能帶來永恆的光明，只要繼續行走，黑暗會再度俯臨。然而，面對新的不確定性與迷惑，我將不再那麼懼怕。我知道只要誠懇並且努力不懈地對自己的青少年教育工作實踐進行反映探究，持之有恆地反映、調整自己的視框及實踐，就可以驅逐闇影，重新堅定自己的步伐。

伍、結語：搭建一個在地平台的重要性

在我們團體結束好一段時日之後，有一天小武敲了賀凱的 MSN，探詢賀凱是否可以幫忙？他弄丟了一台朋友借給他的數位相機，得賠償朋友好幾千元。當下賀凱快速地在腦中針對這個事件做了一番思考，結論還是沒有順應小武的需求，賀凱所抓住的一個核心信念是：這不應該只是一個金錢救急的問題。接下來，兩位作者討論這件事情，達成一項共識是：我們都不希望金錢成為小武和我們之間關係的連結媒介，但同時我們也不希望對於小武的困難袖手旁觀。於是我們構想出一個方案：邀請小武將自己的生命故事寫下來，我們將以稿費的方式來支持他。小武對此方案，確實表現出願意試試看的動機及意願，但後來我們一直沒有收到他的文本。

小武的事件，可以說讓我們原先已經漸漸形成的一個想法更加凝聚了起來。小武以及我們所遭遇的其他孩子，讓我們明白一件事：在團體結束之後，少年們突如其來的一個動作，在我們缺乏一種在地的平台可以和他們進一步一起針對問題進行探究和釐清時，我們對於少年的困難常常所知有限，能夠選擇的回應也就多所受限。又或者可能面臨這樣的狀況：我們對於現象的理解雖然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在缺乏在地工作平台的現實下，後續的行動幾乎沒有條件可以進行。以三兄弟為例，礙於路途遙遠（慈宜在台北，賀凱在花蓮），我們幾乎不可能再提供任何貼近的關懷與照顧，如果他們家突發什麼狀況，我們也難以應變。

然而，我們一直談論到的「平台」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對我們而言，所謂的平台，其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重點是要讓我們在各種

教育或助人工作中所遭遇到的個體其與我們之間的關係有持續發展的可能。如果我們相信關係的涉入是撫慰抒解／生命轉化工作中的一項關鍵的話，如何營造並且延續關係—讓生命有機會可以在誠懇與有溫度的關係裡漸次開展與同行—就成了我們接下來努力的方向。「關係的涉入」這個姿態中最重要的一則涵義是：你是我所在乎的人，我願意陪伴、守護著你，你需要我時我會在那兒。

程度各異的，有不同的方式可以用來表達這樣一種慎重的承諾。給出電話、MSN，或者一個地址。這是我們在既有的條件下，已經使用來延續關係的一種平台的形式。這樣的平台確實可以達到某些功能，以本文一開頭所引的阿歡為例，就是透過 MSN 所表達的關心，讓當時狀況不好的阿歡鼓起勇氣將困擾她多年的秘密傾瀉而出。那個晚上我們在 MSN 上談了很久，讓我們得以根據相對充分的瞭解展開我們後續的支持行動³⁸。

偶爾，我們也透過這類的平台，得知我們的少年的最新近況，如入住中途之家、找到了新工作，當兵等等。但，不可否認的，這樣的平台並不足以讓我們對於如前所述的小武或者三兄弟的狀況做出合乎我們理想的因應。幸而，風信子協會一直非常有意識地持續關照這個團體中的成員，成員們也在他們的溫暖支持下越來越茁壯。

但現實狀況是，從過去到現在，我們遭遇到的許多孩子都缺乏風信子協會這類的支援系統。在我們尚無條件發展成類似風信子這樣一個在地機構式平台（這是我們的長期目標）之前，我們還可以搭建什麼樣的平台呢？這是我們正在思索的嚴肅課題。

參考文獻

余德慧（2010）。人文臨床與療癒課程構想圓桌論壇現場記錄。慈濟大學人文臨床與療癒計畫電子報，8。2010 年 6 月 22 日，取自：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humanhealing/browse_thread/thread/29cc73526c229605?hl=zh-TW。

風信子協會的宗旨（無日期）。2010 年 6 月 20 日，取自：風信子協會網站：

http://www.cuckoo-land.org/modules/xoopsfaq/index.php?cat_id=1。

張士達（2010 年 6 月 20 日）。蔡明亮的「臉」感動無數鄉鎮。中國時報，C3 版。

³⁸ 礙於阿歡的秘密牽涉到比較敏感、隱私的議題，我們無法在此透露任何相關細節。

- 張慈宜 (2010)。邊界上的演出者：在「文明」社會中撐出抵抗與創造的空間。應用心理研究，45，149-171。
- 游賀凱 (2006)。孤獨行者朝向麥田捕手：自殺者遺族的敘說與實踐。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橋口亮輔 (導演) (2009)。幸福的彼端【影片】。台北：原子映象發行。
- Apple, M. W. (2004).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 Buras, K. L. (Eds.) (2006). *The subaltern speak: Curriculum, power, and educational struggles*. New York: Routledge.
- Aries, P. (1962).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Becker, H.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 Bowles, S., & Gintis, H. (1977).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rrigan, P. (1979). *Schooling the smash street kids*. London: Macmillan.
- Cunningham, H. (1992).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Blackwell.
- Fanon, F. (2005)。黑皮膚，白面具 (陳瑞樺譯)。台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 1971)
- Hendrick, H. (2001). Construc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British childhood: An interpretative survey, 1800 to the Present. In A. James & A. Prout (Eds.),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pp. 34-62). London: Falmer Press.
- Larson, J. E., & Corrigan, P. (2008). The stigma of families with mental illness. *Academic Psychiatry*, 32, 87-91.
- Liebow, E. (2009)。泰利的街角 (黃克先譯)。台北：群學。(原著出版於 1967)
- Loader, I. (1996). *Youth, policing and democracy*. London: Macmillan.
- Matthews, H., Limb, M., & Taylor, M. (2005). The street as thirdspace. In C. Jenks (Ed.), *Childhood: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pp. 189-204). New York: Routledge.
- McLaren, P. (2003)。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 (蕭昭君、陳巨擘譯)。台北：巨流圖書。(原著出版於 1998)
- Muncie, J. (2004). *Youth & crime* (2nd ed.). London: Sage.
- Phillips, M. R., Pearson, V., Li, F., Xu, M., & Yang, L. (2002). Stigma and expressed

- emotion: A study of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1, 488–493.
- Skinner, B. F. (1992)。桃源二村（蘇元良譯）。台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於 1948）
- Urwin, C. (1986).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In M. Richards & P. Light (Eds.), *Children of social worlds: Development in a social context* (pp. 257-286).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lkerdine, V. (2005). Safety and danger: Childhood, sexuality, and space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In C. Jenks (Ed.), *Childhood: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pp. 145-163). New York: Routledge.
- Williams, R. (1983).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oodhead, M. (2001). Psychology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needs. In A. James & A. Prout (Eds.),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pp. 63-84). London: Falmer Press.

投稿收件日：2010 年 9 月 6 日

接受日：2011 年 6 月 3 日